



| | |
|--------------|---|
| Title | 關於三大報紙的《抗戰建國紀念日》社論的話語分析 |
| Author(s) | 田中, 仁; 李, 愛華 |
| Citation |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パー. 2008, 2008-1, p. 1-10 |
| Version Type | VoR |
| URL | https://hdl.handle.net/11094/13404 |
| rights | |
| Note | |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rchive : OUKA

<https://ir.library.osaka-u.ac.jp/>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Osaka University
Forum on China**

Discussion
Pap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No.2008-1

關於三大報紙的《抗戰建國紀念日》社論的話語分析

田中 仁（李 愛華 譯）

關於三大報紙的《抗戰建國紀念日》社論的話語分析^{*}

2008年12月10日

田中 仁[†] (李 愛華[‡] 譯)

^{*} 本稿は『近きに在りて』第51号(2007年6月)所収の拙稿「抗戰建国記念日」に関する三大新聞「社論」言説分析の中国語訳であり、2008年8月に台湾で開催された第二回「現代中国社会変動與東亜新格局」国際学術研究会への提出論文である。

[†] 大阪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教授 (tanakahi@law.osaka-u.ac.jp)

[‡] 神戸大学非常勤講師 (liai2003818@yahoo.co.jp)

前言

1938年7月4日，中國國民政府將7月7日定為“抗日建國紀念日”〔戴主編〕。本稿的目的是通過對1938年到1945年期間的《中央日報》、《大公報》以及《新華日報》（以下省略《》）所發表的〈抗戰建國紀念日〉的社論進行比較和分析，以探討日中全面戰爭期間，在中國陪都（臨時首都）重慶的抗戰媒體對這場戰爭是如何認識的。這個課題的設定，在於確認與“抗日戰爭”有關的自我形象的形成過程，同時通過對史實折射出的歷史涵意進行剖析進而提示與本刊設定的共同課題“與現代中國的對話”相關的具體論點。首先介紹一下本稿所提到的三家報刊的梗概：

中央日報：中國國民黨機關報。1928年1月創刊於上海，29年2月以後在南京發行。37年末遷往武漢，不久在長沙發行，38年9月又轉移到重慶。日中戰爭期間的社論當初由設在國民黨中央的“黨報社論委員會”專門提供，之後改由報社的委員自行執筆〔《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出版〕。

大公報：是近代中國有廣泛影響力並由中國人經營的有代表性的大眾性報刊。1902年創刊於天津，37年8月由於日本的侵略而被迫停刊。之後轉移到南方，相續在上海、漢口、香港、桂林、重慶等地發行。作為本稿考察對象的日中全面戰爭時期，該刊一貫主張堅持抗日救國，反對妥協和腐敗〔同上〕。

新華日報：日中戰爭期間和戰後中國共產黨（以下“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發行的大型機關報。1938年1月創刊於武漢，同年10月轉移到重慶，47年2月由於被國民黨當局查封而停刊〔同上〕。

I . 日中全面戰爭與中國的課題

1) 抗戰一年的總結

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經過翌月的上海事變擴大為日中全面戰爭。至同年底佔領了華北和長江下游地區的日軍為了實現南北佔領區的匯合，在徐州展開會戰，並於38年5月佔領了徐州。對此國民政府於37年9月在公佈了包括重新容納中共的體制整編（“第二次國共合作”）並同時構築了戰時體制，同時宣布11月將政府遷移到重慶。之後，中國的黨、政、軍的主要機關轉移到了武漢。圍繞著“臨時首都”武漢，日中間的攻防態勢成為焦點。

1938年7月7日大公報發表了題為〈抗戰建國一周年〉的社論。社論說，由於中國的抗戰，當初日本圖謀速戰速決的方針遭到失敗，不得不轉變為以建立傀儡政權和奪取資源、民力為目標的長期侵略方針。社論提示了敵人軍隊北進或者南進都是為了征服中國的“敵情判斷”。又說，經過一年的抗戰，雖然中國獲得了世界輿論的同情（“中國問題已成爲世界問題”），但是所有問題的關鍵，要靠自己的奮鬥才能解決。還說，今日的中國已具備了歷史上空前的力量（“中國民族已覺醒”“這樣偉大的民族不會成爲亡國之民”），但是“絕不能自我滿足”。主張克服軍事指揮、軍事技術和策略、精神以及紀律、政治、文化、人事等方面存在的缺點，建設新國家、新社會是最重要的課題。

另外，同日的新華日報社論〈抗戰建國紀念日〉，提出了“七七”爲全國爲實現民族的自由和解放進行英勇神聖抗戰的開端，是民族復興的起點。還論及了軍事、外交、政治等各個方面的問題。並主張(1)在緊迫的“第三期抗戰”中（“第一期抗戰”粉碎了敵人的速戰速決方針，“第二期抗戰”堅守徐州6個月，在台兒莊取得勝利）必須完成對“全國的軍事、政治、經濟、交通、文化的中心大武漢的保衛工作”；(2)必須推進“中蘇的親密關係以及中國和法、英、美各國共同防禦日寇的外交政策”；(3)

國民參政會作為戰時民意機關應該完成它必須完成的任務。

2) 戰線的膠著和抗戰的課題

1938年10月隨著武漢、廣州的陷落，日軍的進攻（佔領地區的擴大）和中國軍隊的退卻的戰況告一段落，戰線處於膠著狀態。12月代表國民政府主要政治人物之一的汪精衛脫離重慶，日本政府發表了“睦鄰友好、共同防衛、經濟合作”的對話基本方針（第三次近衛聲明）。對此，國民政府發佈了對汪（精衛）的逮捕令，同時剝奪了與汪共同行動的其親信周佛海等人的黨籍。39年以後，國民政府加強了對中共活動的管控和限制，隨著在日軍佔領區內的中共根據地的不斷擴大，國共兩黨的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張。此外，由於日軍轟炸重慶給市民生活帶來極大的損害，各家報社也蒙受了損失，不得被迫停刊。國際形勢方面，由於38年9月墨尼黑協定的簽定，英法對德國的妥協態度公開化，其將給遠東的政局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受到了關注。

1939年7月7日包括中央日報在內的重慶各報聯合報刊載了題為〈抗戰兩週年〉的評論。評論說，這場戰爭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土地、財產和人命的損失”，認為這場戰爭具有“世界戰爭史上空前的殘酷性”。之後又說，這場戰爭給中國造成的巨大的犧牲和苦難，是我們為了謀求獨立和生存的代價，其痛苦比不抗戰而忍受的痛苦要值得多。並評論說，“我們能堅持兩年的抗戰”完全超出了敵人或者國內一部分人的預想，同時在“對敵人的戰略、策略給予徹底的打擊”這一點上是“我們的勝利”。並進一步指出抗戰是“三民主義”“精神力量”對“暴力”的戰爭，主張這些國民黨的“主義”和“精神”應該集中體現在領袖身上。文章還闡述了王克敏、汪精衛等人的行動是“國內、黨內失敗主義者的本質的暴露”（“國家民族的敗類”），對他們的清除是建國過程中所必須的。同時評論認為“抗戰的前途是光明的，但要取得最後的勝利還會遇到很多艱難困苦”，要求“強化對主義、領袖的信仰和精神力量”。

同日的新華日報社論〈偉大的戰鬥節日〉把兩年的抗戰總結為“史無前例的民族團結、國家統一、政治的進步、力量的成長”，指出敵人的戰爭是“侵略、野蠻、倒退”的，而我們的抗戰正體現了“革命、正義、進步”，所以它與中國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是一致的。作為兩年抗戰的教訓指出了以下五點：(1)中華民族有能力肩負抗戰並最終取得勝利；(2)半殖民地的中國只有抗戰才能生存（“妥協、投降意味著滅亡”）；(3)之所以能堅持抗戰是因為國內的團結（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4)要堅持抗戰，戰鬥力的不斷增強和國內政治的進步是不可缺少的；(5)要奪取抗戰的勝利必須對妥協、投降的行為進行毫不留情的譴責。並且認為敵人正基於以戰養戰的方針，進行政治上的誘降，此外還有國外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中的反動資產階級企圖引誘中國參加新墨尼黑會議。因此，現時局恰恰是“我們的抗戰處於深切的苦難的關頭”。反共會招致民族的分裂，會導致抗戰成為不可能，呼籲依靠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徹底的抗戰。

大公報的社論〈全面抗戰兩週年〉是該報轉移到重慶停刊一百天後為紀念8月13日的復刊而發表的。社論認為由於日本的戰線已經陷於“攻不能勝”的泥潭之中，正在把重點轉向政治的、經濟的侵略。社論針對奪取抗戰的全面勝利，提出三個課題：即(1)秉持炎黃子孫都是中國人的立場，絕不允許動搖抗戰的信念，要有長期抗戰的精神準備；(2)中國的抗戰是雪恥百年屈辱的大事，不能依賴國際形勢，絕對要堅持自我；(3)為了爭取國家、民族的永久生存必須持有忍受巨大苦難的決心。針對這些主張還說，“汪精衛等叛逆者的言行，不僅僅是對抗戰的干擾，他們已經不是中國人，已成為投敵求榮的賣國賊”，“不允許黨派之間的摩擦”，“直言不諱地說，到目前為止中層社會以上的人還未曾經歷過任何苦難，即使個人有錢也不能奢侈，個人的奢侈將給國家帶來損失”。

3) 歐洲的戰爭與中國

1939年9月，與蘇聯簽定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納粹德國進攻波蘭，英法對德宣戰，至此歐戰爆發。40年4月進攻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德軍翌月在西部戰線展開攻勢，佔領了荷蘭、比利時，6月佔領了法國。這樣，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七個國家從歐洲地圖上消失了。同期裡，在中國40年3月成立了以汪精衛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

1940年7月7日的中央日報社論〈第四年〉，就一年來的抗戰評論說，軍事方面襄東、襄西戰役取得了預期的成果，經濟方面使法幣的干擾歸於失敗，大後方的經濟建設也有了顯著的發展。另外，就三年的抗戰總結說，抗戰“改變了五千年的中國歷史，改變了世界歷史”，“以抗戰的艱難困苦和犧牲為代價，使之完成建國的任務”。並且社論對起因於德國閃電戰的國際形勢的急劇變化評論說，蘇聯和美國這兩個太平洋上的大國已成為世界和平的支柱，共同監視日寇的侵略，這是與我們理想的現實很接近的。接著又引用總裁（蔣介石）的發言說，“在遠東，我們已成為所有亞洲國家的前衛，同時又成為蘇聯和美國的側衛、後衛。我們的抗戰在國際關係和太平洋地區的影響這個層面上講是很偉大的，這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由領袖的英明決斷而發動起來的抗戰，在國際關係的激劇變化中因領袖的忍耐、賢明而作為國策能夠堅持下來。並說，堅持領袖提出的“中國的抗戰是對世界的偉大貢獻”，是我們的使命。

一方面，同日的大公報社論〈抗戰三週年獻辭〉說，(1)雖然波蘭、法國等國家滅亡了，但是由於領袖的毅然決斷、將士的奮戰、民眾的艱苦奮鬥所進行的世上罕見的中國抗戰，證明中國絕不會滅亡；(2)對日本來說“七七”事變屬於某種投機行為，但由於速戰速決方針的失敗，使日本陷入了泥潭之中（膨大的軍費、經濟的窘迫）；(3)通過三年來的抗戰，把日本牢牢綁在中國的戰場上，這是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現在中國已經成長為太平洋地區的一個穩定的勢力了。然後作為“我們的課題”又提示了四點，即政治的效率化、積極的軍事行動和堅固的防守、有效的經濟建設、國民的艱苦奮鬥。

對此，新華日報社論〈紀念神聖抗戰三週年〉認為，國際、國內形勢正處於“危急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緊急事態”¹⁾。此外，作為當前的課題提出三點：(1)反對妥協投降。(2)加強團結（團結是抗戰的先決條件，是獲得勝利的推動力）。(3)謀求進步（只有進步，才能增強力量，才能衝破今日的難關）。另外，已經發現該社論有三個地方被刪除²⁾。

4) 小結

到1940年為止的三年中中國被迫與日本進行了單獨的作戰。

上述的三家報刊的社論都認為：(1)中國的抗戰是抵抗日本的侵略，是為國家、民族的生存而進行的戰爭。(2)發動和堅持抗戰不僅發揚光大了民族的自尊心，而且粉碎了日本企圖速戰速決的方針，並將日本拖死在中國的戰場上。(3)這場戰爭是中華民族復興的起點，為了堅持抗戰，獲得最後的勝利，就必須強化國家、民族的團結。(4)必須徹底排除、肅清任何企圖謀求與日本妥協的勢力和主張。

關於全面戰爭下的日本與中國的關係，1939年的各報聯合評論認為是“暴力”與“三民主義”“精神力量”的關係。對此同年的新華日報社論則認為是日本的“侵略、野蠻、後退”與中國的“革命、正義、進步”的關係。筆者希望引起關注的是，前者（中央日報）的“三民主義”“精神力量”被歸結為“領袖”

¹⁾ 中共將從1939年9月的歐戰爆發到41年6月的德蘇之戰開始期間的戰爭的性質規定為“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

²⁾ 關於在日中全面戰爭期間國民政府的言論政策（對新聞、雜誌、圖書的檢閱、審查），參照〔中村〕。

的理論而展開論述，而後者的“革命、正義、進步”是圍繞著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進行的論述。另外，38 年大公報社論說，通過一年的抗戰中國獲得了國際輿論的同情。接著 40 年的社評認為“三年的抗戰……是世界各國的共同的利益”。這一定是以中國的“正義”“公正”為前提針對日本的“暴力”“侵略”所做的論述。

II . 亞洲、太平洋戰爭與中國

1) 陣營對峙的明朗化

1937 年以後的日中全面戰爭（亞洲的戰爭）與 39 年爆發的歐洲戰爭，原來是源於個自背景的戰爭，相互之間沒有什麼關係。但是，以 40 年 9 月的日德意三國同盟關係的形成和翌年 6 月的德蘇之戰的爆發為契機，“軸心國”與“同盟國”的對立日趨明朗化。在中國國內政治方面，由於 41 年 1 月的皖南事變使國共關係極度惡化，國民政府事實上已經喪失了對八路軍、新四軍等中共系統部隊的管控能力。

1941 年 7 月 7 日的大公報社論〈抗戰四週年紀念辭〉認為，從三國同盟結成到德蘇之戰的爆發這一過程是“世界形勢發生巨變的過程”。並評論說，由此，迎來了中國抗戰的新局面，中國的抗戰已成為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也就是說，世界分為日德意的“侵略者集團”和中國與美英蘇的“反侵略戰線”的兩大陣營，這與“我國的戰時外交的目的”是一致的。並且說，由於德意承認汪精衛政權，而使“我國的立場變得更加明瞭”。社論還就四年抗戰的成果，作為今日的課題提示說，“一切重新開始”（不能滿足於現有的成功而應爭取更大的成功，正視失敗，不要重複同樣的失敗）。文章以“中國最終勝利！世界的反侵略友邦勝利！打倒企圖征服中國的日寇！打倒企圖瓜分世界的三國同盟！打倒日汪偽約！打倒漢奸汪精衛！中華民國萬歲！全體國軍將士萬歲！林主席、蔣委員長萬歲！羅斯福總統、丘吉爾首相、斯大林主席萬歲！全世界人類的自由萬歲！等口號結束”。這也能說明重慶的媒體空間在國際政治的新形勢下，對中國的抗戰所處的位置具有明確的認識。

另一方面，同日的中央日報社論〈舉起反侵略的旗幟來〉，對上述的國際政治的兩大陣營化表示了同樣的看法。然後說，中國是“最初進行抵抗的國家”，也是“最初呼籲對侵略國家進行共同抵抗的國家”。社論並向反侵略陣營的友邦提示了四項建議（民族的自由、獨立、平等，尊重自由原則的國際條約，根據國際法、國際條約解決國際糾紛，為制裁侵略行為採取共同行動），呼籲為實現這些共同的目標團結起來。同時社論又說，與利益相比更注重道義是中國人的特徵，今後也要發揮俠義之心刻苦奮鬥。

同日的新華日報作為“代論”刊載了周恩來的題為〈“七七”四年〉的文章。文章把“抗戰四年以來空前的戰績和偉大的收穫”歸結為“前所未有的統一在我們國家出現了，團結和民族覺醒體現在我們人民的身上，統一指揮和意見集中出現在我們的軍隊裡”。文章還把中國抗戰的總體形勢概括為“抗戰的指揮者：國民政府和蔣委員長”；“抗戰的經典：三民主義和抗戰建國綱領”；“抗戰的武裝：數百萬的正規部隊、敵後的游擊隊、膨大的人民自衛武裝”，以及“抗戰的各黨派”和“抗戰的大後方”。並把當前的國際形勢概括為“世界很明顯地正朝著兩個集團、兩個戰線的方向運動，世界反法西斯戰線正在逐漸形成”。在論及敵我關係以及軍事、政治、經濟諸問題時提出“應該克服的課題=我們的弱點”，並由此提示了以下五點——(1)克服困難，增強人民的團結；(2)強化與英美蘇之間的聯合；(3)增強軍事力量、軍事設備；(4)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各黨派之間的合作；(5)加強國防建設。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關於第三點，談到了承認敵後游擊區和游擊隊的作用，關於第五點，提到了對官僚資

本及其投機行爲的取締的主張。

2) 亞洲、太平洋戰爭與中國

亞洲和歐洲的戰爭以 1941 年 12 月的亞洲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爲契機，“同盟國”與“軸心國”這兩大陣營的對峙完全明朗化了。在再次肯定同年 8 月的美英〈大西洋憲章〉的基礎上，42 年 1 月 1 日在〈同盟國共同宣言〉上，中國與美英蘇三國首先簽了名。這樣，中國的抗日戰爭被定位爲同盟國的“中國戰區”，但是另一方面，這一時期由於日軍進攻西南太平洋和東南亞，中國喪失了同盟國提供物資援助的運輸通道，使繼續抗戰又出現了新的困難。

1942 年 7 月 7 日的大公報社論〈抗戰五週年紀念獻辭〉在總結一年的變化時說，抗戰已從單獨抗戰變爲 27 個同盟國的共同作戰。因此，中國已成爲“世界反侵略戰爭的重鎮”，隨之，戰爭的目的已由爲爭取民族的生存和國家的獨立變爲“在東亞建立新秩序”（“中國的抗戰是革命，亞洲全體也正行進在革命的過程之中”）。並提出，(1)堅持到最後；(2)我們與之宣戰的敵人是軸心國，但是從地理位置上看，我們主要的敵人是日本；(3)大家必須共勞苦，而且必須平等（少數人利用抗戰追求私利、積累財富的現狀必須廢除）是非常緊要的。

對此，新華日報的代論，董必武的〈“七七”抗戰五週年〉說，由於世界反侵略戰線的形成和與英美蘇同盟關係的建立，中國已成爲世界四強之一，在東亞成爲反法西斯侵略的支柱。但是另一方面，由於日軍進攻西南太平洋和東南亞，使中國喪失了同盟國提供物資援助的運輸通道，所以，中國的抗戰又面臨著新的困難。代論提示了敵後的游擊隊與游擊區的存在，大後方的奮鬥和美國的援助以及日本面臨的具體情況之後說，這一困難完全能夠克服，主張中國政治的決定因素是“抗戰、團結、進步”。從“敵後的游擊隊和游擊區的存在”和中國政治的“進步”這些提示中可以看出中共的主張（立論中涉及到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另外，還看到這篇文章有四處被刪除的文字。

一方面，中央日報和掃蕩報³⁾的聯合社論〈抗戰五年與新認識〉在評價爲獲得國家的自由、平等、獨立的抗戰五年的進程時說，這是一個“奇蹟”。它靠的是領袖的英明決斷、將士的殊死拼爭、國人意志的一致和友邦的支持。並說，“先打敗日寇是同盟國的最高戰略”。因此，太平洋戰局的重要性正在增大，這說明了中國在同盟國中地位的提高。換言之，中國的任務會更重大（“打敗日寇的責任十之八九在中國”）。要完成這一任務當然需要同盟國的支援，但最重要的是“自力更生”（革命精神=三民主義信徒的精神）。

3) 戰局的轉換與中國

1942 年下半年以後，同盟國在南太平洋和歐洲東部戰線開始反擊。即在南太平洋的中途島海戰取得勝利的美軍開始在日軍最前沿基地島進行登陸戰，還在歐洲東部戰線伏爾加河的要衝斯大林格勒展開了攻防戰。43 年 2 月在瓜達爾卡納爾島和斯大林格勒的軸心國方面的失敗，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全戰局的轉折點。另外，43 年 1 月由於美英取消了不平等條約⁴⁾，中國擺脫了從上個世紀以來的國際上的從屬地位，獲得了在國際政治中實現“大國”地位的前提。

1943 年 7 月 7 日的大公報社論〈抗戰六週年獻辭〉的論點是(1)“七七”事變是以甲午戰爭（日清戰爭）爲淵源，以“九一八”事變爲直接導火線的日本軍閥的侵略性國策的結果。現在，這一國策已成爲有國民廣泛支持爲背景的利己的“國防觀念”和以對外侵略爲基調的日本的民族性；(2)人類生活

³⁾ 《掃蕩報》是軍事委員會機關報，1932 年 6 月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政訓處創刊，38 年 10 月發行重慶版〔《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出版〕。

⁴⁾ 國民政府與美英締結條約的前夕，日本政府與汪精衛南京政府締結了關於歸還租界以及廢除治外法權的協定。

的基礎是互利和互助，這與相互扶助為基礎的以實現共存共榮為目的的“民主國家”的方向是相一致的，也是與中國的傳統、立國精神相一致的（一方面處於與“民主國家”對立的“極權國家”正企圖實現對鄰國的侵略和獨裁統治）；(3)今後中國必須做好與日本進行激戰的精神準備。中國在遠東戰場承擔中心任務，所以也應該參加盟軍在東京舉行的慶祝勝利遊行；(4)抗戰的目的是徹底地破壞、肅清日本軍閥的傳統，解放日本民眾並改造其國民的思想，實現新生的日本。

一方面，同日的中央日報和新華日報社論根據的都是前一天發表的蔣介石的〈告軍民書〉和〈同盟國告民眾書〉的內容。

中央日報社論〈抗戰第七年的展望〉把下一年看作是“決定世界大戰全戰局並奠定同盟國最后勝利基礎的一年”。然後談到“蔣委員長表示的中國的希望”（不可能有“由協議達成的和平”；謀求全人類的解放；建立共同作戰機構；創立戰後世界的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和平機構），並強調了作為戰後經濟發展基礎的抗戰經濟的強化和“發誓不辭辛苦、不畏艱難、集中意志、盡所有的能力，不分散一分鐘的精神，不浪費一分鐘時間”的國民的義務。

對此，新華日報社論〈加強責任，痛切反省：讀蔣委員長兩大文告〉採用了與該文書相似的體裁，社論主張，(1)不管國家還是個人都應該放棄舊的東西，創造出新的東西，盡到目前抗戰的職責；(2)正面的和敵後的軍隊必須相互配合，協同作戰，政府和民眾必須全力支援在前線和敵人後方單獨苦戰的將士；(3)排除生產活動的障礙，肅清畸形的墮落的風潮，建立全國共鳴的刻苦自勵的戰時生活。並認為“抗戰正在迎接決定性的局面”，呼籲“使全國的軍民像一個巨人一樣地緊密地團結起來”，為抗日勝利這一共同又是唯一的目標集中起來，朝著蔣委員長指示的方向，統一步調，一往直前。

4) 小結

1941年7月到1943年7月的上述九篇社論都把中國的抗戰看作與“軸心國”相對抗的“同盟國”任務的一部分。同時揭示了抗戰的意義也是與“同盟國”提出的各種理念相一致的。

新華日報刊載的周恩來、董必武的代論和1943年的社論，即使在國共關係惡化，軍事上共同作戰在事實上已經不可能的皖南事變之後，仍以在日軍佔領地區的八路軍、新四軍等中共係軍隊的活動和抗日根據地的存在為前提，共同闡述了中共的上述論點，也表明了它們在重慶的媒體空間仍繼續佔有其應有的位置。

關於亞洲太平洋戰爭期間國民政府的外交和內政的關係西村成雄認為，對一般所說的內政的外交約束性並不起作用。指出，國民政府的“四強”待遇是由於美國的“招待”而實現的。為此，國民政府為了維持這一外交上的目標被迫進行了內政的改組〔西村 2004，32〕。筆者認為，可以把這時期的三家報刊的社論，作為代表這一時期的重慶政治空間的媒體立場來評價。

III . 戰後中國的瞻望

1) 歐洲戰線的新局面和打通大陸作戰

1943年秋，蘇軍在歐洲東部戰線的主導權的獲得、英美軍在北非奪取優勢和意大利的投降，另外，在南太平洋美軍的制海權、制空權的掌握等等，由此，對同盟國勝利的瞻望越來越呈現出現實意義了。從10月到12月由美英蘇外長舉行的莫斯科會談和“四國宣言”，美英中的開羅首腦會談和美英蘇的德黑蘭首腦會談，由此，同盟國的共同作戰和戰後構想更具體化了。在緬甸北部的反擊作戰中，中國軍對日本軍的正面作戰第一次取得勝利。但是在美軍全面攻佔南太平洋之後的德黑蘭會談上斯大林正式表明了對日參戰的計劃，這使同盟國中中國戰線的軍事重要性相對下降。此外，1944

年 4 月日本軍通過發動打通大陸作戰計劃，使中國喪失了大面積的國土⁵⁾，作為“四大國”之一的中國的現況，引起了國內外的注視和批評。

1944 年 7 月 7 日的大公報社論〈抗戰七週年獻辭〉在回顧近百年的“東方史”的過程中，給日本和中國定了位。也就是說(1)中日兩國都以西方為樣板，力圖實現現代化，但日本取得了更多的成果；(2)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經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而走向帝國主義道路，在吞併台灣、朝鮮的同時企圖侵略中國；(3)成為近代日本傳統的“中國侵略”，為的是干擾中國，使中國變弱，干預中國內政，不能容忍堅強的統一政府的存在。所以，與在革命中奮鬥的國民政府的決戰是不可避免的；(4)“七七”以後到今日的這七年的過程中完全是舊帝國主義走舊路、進行赤裸裸的侵略的舊帝國主義的日本和為了生存進行抗戰的半殖民地的中國的對抗；(5)從歐戰經過德蘇之戰到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形成了同盟國。由此，軸心國的敗退和世界的改造這一國際趨勢已成定局，中國獲得了新世界奮鬥者的地位。社論最後向人們呼籲對於眼前的狀況不要過於樂觀，還要繼續奮鬥。文章引用蔣主席的〈告全國軍民書〉的“軍民共同一致，勵志自勉、奮鬥、抗戰建國和維護世界永久的和平”的發言為結束語。

對此，從同日的中央日報和新華日報的社論中可以看出兩社論的對打通大陸作戰所作的對照性的評價和定位。

中央日報社論〈神聖抗戰七週年〉針對由於日軍的這一作戰而造成的國土的喪失的情況說，對於日軍的攻勢雖然我軍“做了適當的對應”，但還是出現了不可避免的前所未有的犧牲和苦難，這只能歸結為前線的裝備和後方的經濟狀況不足所致。並認為(1)德國投降後，日本想單獨進行這場戰爭是不可能的；(2)還列舉了由於中印間的路線很快就能開通，作為反攻前提的軍需給養問題會得到解決等理由，認為從全體看事態是“樂觀”的。並引用了政府發言人的話說，“過去我們在蔣委員長的指導下攻克了許多難關，現在也同樣會在蔣委員長的指導下繼續突破難關”。同時又總結說，七年間中國的神聖抗戰史將作為以大西洋憲章為根本，開創新國際秩序基礎的大事被記錄下來。

一方面，新華日報社論〈加強作戰努力，爭取最後勝利！：“七七”抗戰七週年紀念〉，對於自 4 月以來由於日寇的進攻，大片國土的喪失和人民的流離失所表示憤慨。並說“人民的一致要求”是再也不能喪失更多的國土了，必須加強民主、加強團結以及更新政策和政務。社論還分析了國內形勢，認為“對人民的抗戰勝利和自己力量的信念與認識變得越來越堅定了”。具體上講是敵後的 8800 萬同胞已從日寇、漢奸的奴役下解放出來，正在過著民主的生活。還擁有 210 萬民兵，正在為反攻積蓄力量。這裡說的是中共抗日根據地的情況。這篇文章以下面的內容結束：(1)中共和敵後部隊信守實行革命的三民主義、四項諾言⁶⁾，因為它們得到了人民的擁護；(2)中共主張與內外所有的抗日勢力進行民主合作，希望國民黨也朝著這個方面作最大的努力。

2) 對抗戰勝利的展望

歐洲戰線 1944 年 6 月由於發動諾曼底登陸作戰而迎來了最終局面。8 月至 10 月由美英蘇中四國召開的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使大戰後設立聯合國的設想更具體化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政府試圖結束導致十月美國召回史迪威的中美之間的角逐，謀求獲取戰後國際政治中大國地位的認同。為此，必須整頓包括中共問題在內的國內的各種條件，這是獲得作為“大國”的實際條件所不可缺少的。45

⁵⁾ 1944 年 5 月，渡過黃河的日軍打通了平漢線並西進佔領洛陽。6 月佔領長沙。之後，日軍在 8 月攻克了位於粵漢線與湘桂線交叉處並設有美軍機場的衡陽，11 月佔領了桂林、柳州、南寧，12 月打通了連接印支半島的公路。

⁶⁾ 1937 年 9 月，在達成“第二次國共合作”之際，中共公佈的宣言：(1)實現三民主義，(2)停止暴動政策與土地沒收政策，(3)取消蘇維埃政府與實行民權政治，(4)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

年 1 月以後國民政府公佈的向憲政過渡的具體的程序就是據此而來的。一方面中共在 4 月的黨的大會上作為戰後的構想提出了聯合政府的提案。

1945 年 7 月 7 日的中央日報社論〈抗勝建成的最後一關〉指出，抗戰八年的成果在於通過全國軍民的努力和設計師蔣委員長長的領導，在於架起了能使對日抗戰能取得最終勝利和實現民主憲政的“兩座橋樑”。關於前者說，福州等地的光復只不過是最後勝利的前奏，而最後的決戰則剛剛開始。今後在 4000 英里的戰線上展開的大規模反攻戰役一定要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至於後者，雖然關於具體內容還有考慮的餘地，但已經決定了國民大會的召開日期，今後要以“求大同存小異”的精神，團結一致，共同奮鬥，實現國家的獨立與統一，堅持走民主憲政的道路。呼籲對正在召開的國民參政會議要毫無顧慮地表明自己的見解。

對此，新華日報社論〈民主、團結、進步：迎接勝利的明天〉的主旨是：(1)經過八年的抗戰中國人民覺醒了（他們已經具有了決定自己命運、掌握國家權利的能力）；(2)目前的問題是如何盡快地取得最後的勝利。這個答案就是實現民主，加強全國人民的團結；(3)所有的問題歸根結底是民主的問題，即只有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保障人民的權利（民主與抗戰不能兩立，民主會導致混亂的想法是錯誤的）；(4)中國的前途是走民主的道路（以民主的原則為基礎實現團結和統一），還是走專制的道路，二者必居其一，前者才是人民支持的唯一的道路。

另外，大公報社評〈抗戰八週年獻辭〉指出，抗戰第九年是為取得抗戰勝利，達到建國目標而創造環境的一年。關於前者社論說，對於日本來說這一年是清算歷史的一年，日本戰敗是無疑的。但假如中國不能取得軍事的勝利，那就是我們的失敗。政府和軍民必須團結一致進行軍事反攻。關於現代國家的建設（後者），社論說，不否認因戰時準備不充分，但是即使抗戰勝利中國成為世界的四強五強之一以後，如果沒有與此相應的實質性的東西，也不可能繼續保持這個地位。主張在艱難困苦中也要為建國切實地做好創造環境的工作。關於建國創造的環境條件社評指出，要實現內外的和平環境（對內確保以和平協議為基礎的統一和團結，對外要與所有的鄰國建立確實可靠的友好關係），“在明朗的開明進步的氣氛中尋求這一環境的實現”。

3) 小結

如上所述，針對 1944 年 7 月的打通大陸作戰以及 1945 年 7 月的中國的戰後設想，中央日報與新華日報展開了觀點鮮明而截然不同的論述。即前者強調“蔣委員長”的指導作用；後者強調“人民”的立場。45 年 7 月的新華日報社論提出“走民主的道路，還是走專制的道路，應該由人民來選擇”時，當然中共的這一指導“人民”的論點是包括在這個前提裡面的。

從這點來看，1945 年的大公報社評指出，中國要想確保“四強五強”的一角，必須獲得對內、對外的國家的實力，而作為它的前提是要求實現內外的和平環境。可以說這是根據當時中國政治的實際情況所提出的切中要害的論點。

結語

根據上述考察，(1)中國的抗戰是為國家、民族的生存而戰，是中華民族復興的起點。這一認識是單獨抗戰時期的三報社論所共有的認識。(2)以這種認識為前提所說的抗戰的“正義”“公正”提法的正當性，到了亞洲、太平洋戰爭期間被認為與“同盟國”所提倡的諸理念相一致的。(3)抗戰末期的中央日報將“蔣委員長”的指導作為論點的核心。與此相對照，新華日報則強調抗戰中“人民”的作用。

這裡所確認的有關抗日戰爭的自我形象在 20 世紀後半期由大陸和台灣分別繼承下來⁷⁾，是當今海峽兩岸各自的歷史教科書關於“抗日戰爭”內容的基本框架⁸⁾。

現在，作為歷史學研究（東亞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課題，有歷史認識問題，但其中心論點是戰爭責任問題和殖民地責任問題。如果說與本稿有關聯的話，首先可以認為前者屬於中國，後者屬於台灣。儘管這樣，鳥瞰正在不斷發生質變的 21 世紀的東亞世界，在構想日本應處的位置時，這樣單純的二分法恐怕不能提出有效的方案來，回顧十余年來兩岸關係的互動局面——比如說，台灣總統的直接選舉和中國的反國家分裂法的制定就會不言自明的。從這種意義上說，對“抗日戰爭”形象的歷史範疇進行多面的審視，可以說是構成接近這一課題本質的基礎作業的重要一環。

文獻

- 中村元哉（2004）《戰時言論政策と内外情勢》（石島紀之・久保亨編《重慶國民政府史の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pp.281-300.
- 西村成雄（2004）《第 2 四半世紀中國政治と宋子文の外交資源》（西村成雄編《中國外交と國聯の成立》法律文化社）pp.15-46.
- 田中仁（2004）《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東北アジアの新環境：高校歴史教科書を素材として》（大阪外國語大學言語社會學會《EX ORIENTE》第 10 卷）pp.45-74.
- 田中仁（2007）《“戰後”“抗戰勝利”紀念日と東アジア》（西村成雄・田中仁編《現代中國地域研究の新たな視圈》世界思想社）pp.194-232.
- 戴月芳主編（1992）《20 世紀中國全記錄》錦繡文化企業社 1304p.
- 《中國大百科全書》光盤 1.1 版（2000）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⁷⁾ 在 20 世紀後半期，《人民日報》和《中央日報》的社論是如何提及“抗日戰爭”史像的。參照〔田中 2007〕。

⁸⁾ 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以及日本的高中歷史教科書中，關於抗日戰爭（日中戰爭）的敘述。參照〔田中 2004〕。

「抗日建国記念日」に関する三大新聞「社説」言説分析

田中 仁（李 愛華 訳）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Editorials regarding the Resistance National Day of China

TANAKA Hitoshi (trans. Li Aihua)

要 旨

1938年7月4日、中国国民政府は7月7日を「抗戦建国記念日」とすることを定めた。本稿の目的は、1938年から45年にいたる『中央日報』『大公報』と『新華日報』の「抗戦建国記念日」の社論を比較・検討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日中全面戦争下の中国における陪都（臨時首都）であった重慶の抗日メディア空間においてこの戦争がどのように理解されていたのか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ある。

本稿の考察によって、(1)中国の抗戦は国家・民族の生存を賭けた戦いであり、中華民族の復興の起点であるという認識が単独抗戦期の三紙社論の共通認識として存在していたこと；(2)こうした認識が前提としていた抗戦の「正義」「公正」という正当性は、アジア太平洋戦争期にいたって「連合国」が掲げる諸理念と合致するものと見な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3)抗戦末期の中央日報がこうした論点の核心に「蔣委員長」の指導を置いたのに対して、新華日報は抗戦における「人民」の役割を強調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を確認した。

担当委員（許衛東）